

# 1930 年代中國生物學界的一場論爭

胡宗剛

( 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 )

中國近現代生物學的歷史上，曾發生一場經典生物學與實驗生物學之爭，早已有學者就這場爭論撰寫成文，予以評述。本文進一步發掘史料，對論爭之經過再作詳細之記述。

關鍵詞：中國近現代生物學史 胡先驌 秉志

## 壹、中國經典生物學派之建立

中國現代生物科學，肇始於清末民初，而能與國際同行進行交流與對話，則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其時秉志與胡先驌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科組建生物系，隨後創辦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以西方教學和研究建制為最高標準，筆路藍縷，漸次得以實現。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南京雲集了許多生物學家，如陳煥鏞、張景鈺、錢崇澍、陳楨、張巨伯等，也培養了一代生物學俊彥，如王家楫、伍獻文、倪達書，張春霖，壽振黃、張孟聞，崔之蘭，張宗漢，耿以禮、方文培，鄭萬鈞、吳中倫等，故秉志、胡先驌被譽為中國生物學之奠基人，生物研究所則被譽為中國生物學家的搖籃。

以歷史的觀點看，生物學首先關注的問題是生物體外部特徵，以形態學、解剖學為手段，按系統學進行分類研究，這些被稱為經典生物學。中國生物資源至為豐富，秉志、胡先驌在開創中國生物學時，認為首要之務是探明動植物種類。生物研究所遂致力於動植物標本的採集。在生物所的影響和指導下，後來又有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廣州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後改名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的創辦，也都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只是按所在地域不同而各有所側重。當時政府對科學研究的撥款甚少，研究經費主要來源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秉志、胡先驌所領導的事業符合中基會資助的首選領域，得到中基會幹事長任鴻雋的認同。他曾說：「一國科學的發達，總不免有地方關係的在先，有世界性質的居後，我國當然不是例外。而中基會對於地方科學的進展，曾有極大幫助，也是顯著的事實。生物科學和地質科學一樣，都帶有地方性質，非先經過一番調查工作，不能得到當地的材料以成為本國的科

學。」<sup>1</sup> 故而中基會給予了大力資助，其中，靜生所還是中基會出資與尚志學會共同創建。秉志、陳煥鏞本人還被列入中基會的研究教授，由中基會提供豐厚的薪金，在研究所內專心從事研究，一般大學教授月薪在 300 元，而此研究教授則有 600 元，令人羨豔。

## 貳、實驗生物學派向經典生物學挑戰

西方生物學發展到十九世紀末，由於受物理學、化學等學科的影響，開始以實驗的方法去探求種種生命現象，或謂之實驗生物學。進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中國在西方國家學習此類科學有成者，也漸漸回國，回國之後，看見中國生物學界被經典生物學所把持，不免要提出批評，為自己爭取學術地位，以獲得資金支援。

首先提出意見的是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汪敬熙。一九三二年八月汪敬熙在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第 12 號上刊出其《中國今日生物學界》一文，他說：「無論在純粹學理的研究方面，或在純粹實用的研究方面，現在我們都是應該提倡實驗生物學，至少應該用一部分的財力和人力致力於實驗生物學。」<sup>2</sup> 如此呼籲，也屬情理之事。汪敬熙 ( 1893 - 1968 年 )，山東濟南人。一九一九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往美國霍布金斯大學醫學院留學，從事心理學和生理學研究，一九二三年獲博士學位。一九二七年回國任廣州中山大學心理學教授，一九三〇年任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並創建了心理學實驗室。由於汪敬熙出自北大，與傅斯年、羅家倫同為《新潮》成員，思想趨於激進，對有保守傾向的南高、東大或有成見。他也曾申請中基會的研究教授席，一九二八年七月致函胡適，請為謀求，他說：「聽說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有所謂 Research professor 者 ( 研究教授 )，但是此種講座從未在各學校設立過，不知確否？如確，可否請為熙謀一下？熙現在系佔據該會在中大設立之科學講座之一。熙想改為 Research professor，既是為上述的緣故，想有一更好的機會，利用壯年的精神，做出一點科學的事業。」<sup>3</sup> 一九三一年六月為此汪敬熙又致函傅斯年，請為幫忙，傅斯年將信件轉給胡適，因為胡適是中基會的董事，任秘書一職，該函收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其云：「基金講座事，弟意在得一研究講座。年來弟備受中大及某社的悶氣，望母校可給弟一揚眉吐氣之機會。若定當努力工作，不負此機會。如母校只給弟一普通講座，弟精神之痛苦，一定影響弟之教書及研究工作也。此意弟可與兄言，難與夢麟及適之二先生直陳也。」<sup>4</sup> 汪敬熙備受某社的悶氣，當是指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秉志。秉志是研究教授，而他不是，這也給他不小打擊。然而，汪敬熙的申請終而未果，更加重了他失落的情緒，這些都表現在他的文章中。他說：

在中國研究分類學最大的目的，似乎應該是求做出一個中國所有的動植物的分

類的總賬簿。如以此為目的，分類學家是應該合作，並且應該歡迎合作。但是據我

<sup>1</sup> 樊洪業、張久春選編《任鴻雋文存——科學救國之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537頁。

<sup>2</sup> 汪敬熙〈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獨立評論》，1932年，第十二號

<sup>3</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487頁

<sup>4</sup> 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七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628頁

們看來，我們的分類學家似乎不以此為目的，而是以改正他人的錯誤和發現新種為目的。兩樣之中，尤其重視新種的發現。改正他人的錯誤而出之以卑視他人的態度是易啟爭端的。中國的動植物分類的研究是一未經大發掘的礦山，礦中金塊雖多，但不是無限的。並且新種的發現先後，在重視此點的人眼光裏，是非常重要的。誰先發現，誰便可以把自已的名字附在此新種學名的尾上，同此新種，永垂不朽。因這些緣故，分類學家中，有時不免有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愈激烈，愈見得競爭的人底未成熟。至於競爭而用卑劣的手段，就真是中國科學界一種可悲的事了。<sup>5</sup>

顯然，汪敬熙從學術之爭，轉而進行人身攻擊。作為經典植物學的領軍人物胡先驕豈能坐視，以其素有行文敏捷之筆，立即寫就《與汪敬熙先生論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的反駁長文，也刊于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第 15 號上。胡先驕（1894—1968 年），字步曾，江西新建人，時在北平執掌靜生所。文中先說明中國生物學界大致情形和研究內容，後於汪敬熙發難之語有下列回應：

至於所謂「研究分類學最大的目的，似乎應該是求做出一個中國所有的動植物的分類的總賬簿」，「分類學家是應該合作」。誰曰不然？所謂總帳簿者，動植物志是也。所謂應該合作者，即此類動植物志之編纂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擔任，而必須求助於人之謂也。以植物分類學而論，北平、南京、廣州三研究所，各有分擔編纂北方、東南、西部、南方四植物志及中國樹木志之計畫。每一植物志亦非一人所能擔任，必須互相幫助，方克有成。此數研究所互相交換標本，互相切磋，關係極密。兩研究動物機關亦然。此外尚與其他大學生物研究室交換標本，互相談論，書劄甚勤，汪君從何知中國分類學家不合作耶？至謂分類學家以改正前人之錯誤及發表新種為目的，此亦隔靴搔癢之說。夫前人有錯誤，自不得不改正之，自己有錯誤，亦

---

<sup>5</sup> 汪敬熙〈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獨立評論》，1932 年，第十二號

莫不然。此為求真之精神，在分類學如此，在其他科學亦莫不如此。……中國分類學家職責既在整理中國之分類學，則安能聽其謬種流傳，不加糾正？至於發表新種，苟誠為新種，安可不發表？此為研究分類學之職責，並非有意出風頭。

文章最後說：

在中國無論何種科學皆當提倡。而某種科學之發達與否，全視治此學者之努力。社會人士但當視其努力之結果如何，而予以獎掖與輔助，決不可有先入之見，妄為軒輊，而有偏枯之說；而已非內行，不知甘苦，尤不宜輕加批評。汪君學者，或不以為斯言為河漢歟？<sup>6</sup>

胡先驕的反駁允為公允。胡適為現代中國開風氣之人士，宣導言論自由，《獨立評論》是當時重要的同人刊物，為學界提供論爭的平臺，有較大影響。胡先驕的回應之後，汪敬熙又作一文，云「我極不願意由學問上的討論，走入個人間的攻擊。」其實汪敬熙所言與其所標榜是有距離。但是即便如此，這場爭論尚未結束。

### 參、胡適倡導學術論爭

兩年之後的一九三四年，自《獨立評論》第 87 號起連載汪敬熙的「閒談」，開始時，胡適在「編輯後記」言：「汪敬熙先生是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我們希望他今回發起的科學『閒談』，可以繼續寫下去。」此回汪敬熙所談還是經典生物學與實驗生物學在中國發展的不平衡的老話題。《閒談之一》即云：

對於學術界以外的人，實驗所得的結果，更難引起注意。標本之美麗，可以使普通人贊許；標本之多，可以使普通人驚異。幾行數目，幾條曲線，幾個數學公式，幾張實驗紙載的照片，在普通人眼裏那有看的價值。並且實驗的結果決不是可以大量生產出來的。<sup>7</sup>

兩年前汪敬熙所感到的不平衡，仍然鬱結在其心，胡適恰又為其提供閒談的機會。《閒談之二》即點名批評秉志不懂實驗生物學。

現在國內生物學界有一種見解，說以歷史上看來，分類及形體學是根本，實驗

<sup>6</sup> 胡先驕〈與汪敬熙先生論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獨立評論》，1932 年第十五號。

<sup>7</sup> 汪敬熙〈閒談之一〉，《獨立評論》，1934 年第八十七號

生物學只是一個後起的新奇的枝葉罷了。去年夏天，在中國科學社，秉志先生所講演的生物學史就足以代表此種見解，這個瞭解只是國內學術界尚未瞭解實驗方法的象徵之一。在歷史上來說，這個見解也是不對的。<sup>8</sup>

秉志所倡導的生物學研究，未開展實驗生物學的課題，是不爭的事實。但說秉志不瞭解實驗生物學，則言之為過。秉志（1886—1965年），原名翟秉志，字農山，曾用名翟際潛，滿族，河南開封人。前清舉人，一九〇九年京師大學堂畢業，之後考取第一屆退回庚子賠款留學生，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生物系學習，跟隨著名昆蟲學家尼丹（J. G. Needham）研究昆蟲學，於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八年先後獲得理學學士和哲學博士學位，並為美國 Sigma Xi 學會榮譽會員。畢業後，又往費城，在著名的韋斯特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跟隨著名神經學家唐納森（H. H. Donaldson），從事脊椎動物神經學研究，造詣精深。在康奈爾大學時，參與創辦中國科學社。其在美國九年，廣泛涉獵動物學各分支學科，以為在中國大學領導學生，必須各門學科皆精通，如解剖學、生理學、分類學、遺傳學皆有甚深的造詣。涉獵所及，如英國文學與哲學，中國傳統文化也都有心得。生物學研究領域甚廣，在中國開闢此學，只能從基礎學科開始，實是無暇顧及其他。

汪敬熙獨自閒談大約持續了半年，愈談火氣愈大，到《閒談之十二》幾乎有吵架的氣勢，「你還不知道我是什麼樣子的人嗎？」。胡先驥實在忍耐不了，作《讀科學雜誌隨筆》一文，刊於《獨立評論》（第 104 號），文中借閱讀美國《科學》雜誌上一篇綜述植物學現狀的文章，來回擊汪敬熙，指出其「器小易盈，因已有一得之長，遂不肯虛心，而對他人之工作，不惜輕於評駁，故為生理學張目者，每鄙視分類學與形態學。」<sup>9</sup> 胡適在「編輯後記」中是這樣介紹作者的：「胡先驥先生是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他是國內植物學界的一個領袖」，似乎是站在公正的立場上。

胡先驥《讀科學雜誌隨筆》六月十日刊出之後，六月十四日汪敬熙又邀得北京協和醫學院張錫鈞一文，並寫信向胡適推薦，其函如下：

適之先生：

協和生理學教授張錫鈞先生看見胡步曾先生以教訓得口吻，罵國內學生理學的人的文章，自動的寫了一篇通信，他叫熙送給先生，並請先生登在《獨立評論》。

此信可登，步曾先生既罵人，旁人自要抗議，且此通信口氣也不若步曾先生之凶也。

<sup>8</sup> 汪敬熙〈閒談之二〉，《獨立評論》，1934年第八十八號

<sup>9</sup> 胡先驥〈讀科學雜誌隨筆〉《獨立評論》，1934年第一〇四號

敬熙 謹上 六、十四<sup>10</sup>

張錫鈞的通信刊於七月一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 107 號)上。

#### 肆、胡先驕憤然反駁

如此反復，更加激怒了胡先驕，當即又作一文予以回擊，寄給胡適並附一函。筆者在檔案中發現此函，及胡適在處理胡先驕稿件時致任鴻雋一函，在有關胡適的著作中皆未曾收錄或言及，彌足珍貴，此將二函照抄如下：

適之兄鑒：

今呈上一文，請登《獨立評論》，如汪敬熙從此不再在《獨立評論》作文罵人，弟此後亦不再作此類之文。兄應知汪敬熙屢次作文攻擊農山，其動機實由於中山大學之糾紛，而傅孟真實為主動之人物。若汪仍從續作此類文字，或兄以弟此文過於感情用事，不允在《獨立評論》發表，則弟更將作一較此更為明顯之文在他處登載，則與汪、傅二人之面子殊不好看也。

專此，即頌

刻安

弟 先驕 拜

此場糾紛始自辛樹幟，而辛近日與弟及農山感情甚好，傅孟真、汪敬熙態度如此，具見二人氣度不及辛也。<sup>11</sup>

從此通短函，尚不足以知悉雙方爭論的起因，但可知已不僅僅是為學術而學術，還有深層的人事關聯，且涉及人士較多。辛樹幟（1894—1977年），留學德國，著名農學家，時任國立編譯館館長。胡適敞開言路，任人爭鳴，到了這個時候也難處理，只好請任鴻雋來幫忙。其致任鴻雋函云：

叔永兄：

<sup>10</sup> 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七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636頁

<sup>11</sup> 胡先驕致胡適函，1934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靜生生物調查所檔案

送上步曾兄文一篇、函一件，此兩件我壓了幾天，不曾給誰看，只今夜在君見看了一次(在君：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見看」：原文如此。引者注)，現在送給你看，我想請你和步曾兄細談一次，他在此文中舉兩例，指斥中基會科學補助金審查者之有成見，其一例甚至於間接殺死一個「最有希望之青年學者」！此項控訴如果屬實，中基會董事會不能辭其責，吾兄尤不能辭其責。我記得歐陽翥是得過中基會的補助金的，乞一查複。我還記得老秉托我為此君向朱經農說項，我前年到長沙曾聽說此事，似乎歐陽君之事是因他已滿期，而中基會不再延長？若然，則步曾所說為無據。無論如何，此事應認真一查。步曾是靜生所，他既作如此公開控訴，我們不能不負責任。關於此，我的意見是如此的：步曾若明白討論《獨立》所登任何文中錯誤之點，我可以登載，若寫論 personalize，我不能登載。

明天是假日，故作此書送你府上，匆匆，問

雙安

廿三、七、八<sup>12</sup>

問題越來越複雜，今不知任鴻雋是如何回復胡適，也不知任鴻雋是如何與胡先驥相談，至於胡先驥的所投《獨立評論》的文章內容如何，也不得而知。汪敬熙在《獨立評論》辟長達半年之久的《閒談》專欄，至此結束，其矛頭所指，也可說明胡適的傾向。一九四九年之後，胡先驥曾經說：胡適聯合汪敬熙等反對我和秉志<sup>13</sup>。在這場論爭中秉志未曾參加，但對所遭到的攻擊，曾有言：「國人不知崇尚實學，惑於輕言。夫分類學為研究生物學之基礎，品種不明，其他皆無所建立。部署初定，正擬邁進，此在歐美，贊揚扶翼之不遑，寧憂困乏？乃功業未立，毀謗已至，士人不務所學，惟浮詞抵誦是尚，良堪惋歎。」<sup>14</sup>

<sup>12</sup> 胡適致任鴻雋函，1934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靜生生物調查所檔案

<sup>13</sup> 胡先驥〈對於我的舊思想的檢討〉，1952年。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檔案

<sup>14</sup> 張孟聞《中國科學史舉隅》，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1947年，77頁

## 伍、爭論之影響

參與入這場爭論的人員雖不多，據筆者所知在當時僅有科學社生物所汪振儒在《獨立評論》上撰文說，經典動植物學在中國也只是剛剛起步，發展還遠遠不夠；<sup>15</sup> 中山大學動物學教授張作人在《生物學雜誌》上撰文，主張中國生物學應全面發展<sup>16</sup>。秉志、胡先驕所領導的事業未受到影響，還在不斷壯大，終成為民國時期成就最大的學科之一；而實驗生物學依舊，沒有獨立的研究機構，致使後來一些學人從國外留學回國後，求職都發生困難，如遺傳學家談家楨，植物生理學家羅宗洛等，時至今日，一些為他們寫傳記的作者，仍把矛頭指向秉志、胡先驕所把持的學科領域，<sup>17</sup> 使得爭論的影響延及甚久遠。一九四九年鼎革之後，因經典學派與英美動植物學界有著密切的交往，而受到來自政治的批判；<sup>18</sup> 中國科學院成立之後，整個科學機構予以重新組合，再加上科學事業的進步，這種局面才開始改觀。

二千零四年十月寫於廬山植物園  
二千零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改寫

<sup>15</sup> 汪振儒讀了〈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以後〉，《獨立評論》，1932年第十五號

<sup>16</sup> 張作人〈對於今後中國生物學界研究之意見〉，《生物學雜誌》，1935年第二期

<sup>17</sup> 趙功明著《談家楨與遺傳學》，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78頁。談家楨於1937年留學歸國，往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求職，卻未能如願，「談家楨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冷淡及不被中央研究院動植物所所接受，這並不是個人恩怨、好惡之關係，其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面的。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在30年代中國生物學界的分類學派和實驗學派之爭的大環境中，可以看到，實驗生物學研究引入中國是困難重重的。除了用於實驗的經費短缺外，更主要的是觀念上的變更。談家楨從事的實驗遺傳學想進入以形態、分類為主體的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自然是一件不那麼簡單的事情。」

黃宗甄著《羅宗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0頁。羅宗洛是中國著名的植物生理學家，留學日本。書中言及1932年羅宗洛在中山大學遭排擠云：「中國科學社某元老，擔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董事，有權有勢，欲控制國內生物學界的生殺大權，將魔爪伸入中山大學，奪取此大學生物系的地盤，首當其衝的就是羅宗洛。」

<sup>18</sup> 吳征鎰〈中國植物學歷史發展的過程和現狀〉，《科學通報》，1953年2月號。文中對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國植物學有這樣的評論：「早期的領導人一般都是美國英國留學的，哈佛大學的尤其多，其他法、德、日本留學只有少數。由於中國植物豐富，由於阿諾德樹木園 (Arnold Arboretum) 和丘園 (Kew Garden) 偏重分類，由於這個工作所需的設備比較簡單，當然也由於分類學是植物學同時也是農學、林學的必要基礎，所以植物分類學這門科學便單獨獲得了較大的但是畸形的發展，而在發展中同時也加深了帝國主義影響的烙印。」